

译学研究叩问录

——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

张柏然 辛红娟 著

南京大学出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文号：14BYY025

张柏然
辛红娟 著

译学研究叩问录

——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 / 张柏然，辛红娟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305-17716-3

I. ①译… II. ①张… ②辛… III. ①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029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

著 者 张柏然 辛红娟

责任编辑 张淑文

编辑热线 025-83592401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3.75 字数 277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716-3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我国译论建设应该“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亦即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古今沟通,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话语体系。因此,古今沟通与中西融通,便成了一个关涉我国翻译理论建设前途和速度的重大问题。

中国古代译论如何进入到现代译论体系中,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中国古代译论中有许多精文而且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往往是西方译论所缺乏的。古代译论需要我们的解释才能进入到现代译论。第二个方面,古代译论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思维方式不一样。古代译论是整体的、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与现代译论概念性的、逻辑的、推理的、认识论的方式不同。可以说中国译论:直面“浴火重生”,现代译论的思维方式是认识论的,而古代译论是存在论的,这种存在论思维方式过去被看不起。20世纪,西方思维方式出现转换,由认识论转向存在论。海德格尔、萨特等都朝存在论方向发展。而我国古代译论本身就是存在论的。西方现代译论尤其是语言学派的译论过于重视字词句,却往往不在整个作品的语境中重视它们。实则,对字词句的理解应在作品的整个语境中进行。中国古代译论特别重视这一点,立足现在,审视和重新解读古代译论,不难发现,微言大义的古代理论中常常蕴涵着很

现代性的话题。

我们觉得中国译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中西融通正在推进。中西译学思想传统,同具人类理性认识的某些普遍性价值。中西文化精神对于人文价值等的追求,有某些可以相通的地方。中西融通应该首先把中西译论的相似点、相近点找出来,加以比较、沟通,然后形成互补局面。中西译论只能是相似、相通,而不能是相同。如果我们把这些方面找出来,形成互补,就达到一种交融的境界。中西译论全面融通之日,就是中国译论成熟之时。现在还没有达到,尚需努力。

中西译论融通是有前提的。所谓“中西融通”,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将我们民族的翻译理论资源输入现代语境,与我们现代视野中的西方译论,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沟通,从中挑选出更符合翻译现象实际的理论范畴和命题,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和建构,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理论资源参与的翻译理论新形态。在过去的苏式译论和西方译论里,只有西方人关于翻译的言说,其片面性是不可避免的,与中国翻译实践也是有距离的。诚然,不能因为要突出中国特色,就可以轻视或勾销普遍性价值。也不能因为要引进西方观念,就只承认西方才具有普遍性价值;中国的学问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以西学为标准。中西融通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这些缺陷。

一说“古今沟通”,有些人便简单地理解为复古,这是一种误解。一方面,古代译论是产生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中,是古人对古代翻译现象的思索,而现在文化语境不同了,翻译对象不同了,所以古代译论不可能全面具有现代意义。我们开发利用的只是其中具有现代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在未来的理论体系中,虽说是一部分中国古代译论资源取得了话语权,但也不是局部的复古,而是古代译论某个命题或范畴在现代意义上的激活,

它表面上虽是一个中国古代译论的命题,而实际上是用在现代意义上面了。这已是一种理论的再发现,再创造。所以,我们对古代译论资源的态度,是一种立足于现代理论沉思的选择。

对“中西融通”的误解是将其等同于中西比较。目前,中西比较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即使是就中西译论比较与中西译论融通这个单一的课题而言,也是有区别的。前者,以“比较”为目的,以再勘定中西翻译及其理论的同与异,为对话打下基础,对中西融通是有利的;后者是以理论创新为目的,仅是对中西翻译理论中共同性的东西、互补性的东西进行融通,从而提出新的范畴和新的理论,所以“中西融通”贵在融通中有创新,融通的目的的是为了实现创新。

现代问题意识,是我们从事中西融通的思维动力。也可以说是对西方译论本身缺陷和它与中国翻译实际的矛盾的思考。由于“五四”以来我们的理论创造相对来说少了,所以,目前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仍是搜索中国古代译论宝库,考察在中国古人的理论思考中,有没有可以用来解决当代问题的资料和因素。如果有,就必须将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古代译论的资料和因素提炼出来,从古代译论形态转化成现代译论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就叫做“中国古代译论的现代转换”。

所谓“转换”,大约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对概念的清理与界定。由于中国古代译论一般没有界定范畴的习惯,一个范畴可以有多种称谓去表述,更可以将一个范畴,随机地在引申的意义上使用。所以,如果不首先对这些有现代意义的范畴概念进行清理和界定,也就是说,不用现代的逻辑范畴的一般要求将古代范畴转换成现代译论可以接受的范畴,是无法利用它们达到现代目的的。其二,还必须对古代范畴内涵和外延进行理性的梳理。常识告诉我们,对某个概念的理性界定,必须建

立在对它所概括的对象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的全面揭示与真实的把握上。古代译论虽然很少做这样的工作,但由于它的理论建构往往是基于对翻译现象的知觉体验或心理感悟,所以,这种非逻辑范畴与逻辑范畴相比,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则更胜一筹,很少会出现什么伪命题。因此对古代译论范畴的内涵与外延、本质与特征进行理性的梳理,完全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善于将古人散金碎玉式的论述用现代理性眼光连缀起来,并给古代译论建构一个理论语境,加以适当的阐释,是有助于建构一个现代性的翻译理论的。

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应该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路线,纳入中华文明史的过程,从而建立现代中国的翻译学学理体系。这就是翻译研究的过程哲学。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它在建设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时候,都是以本国的翻译经验作为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写翻译理论著作,都会以本文化系统的材料为基本材料,很少甚或不会把中国的材料、印度的材料、阿拉伯的材料作为基本的材料。我们的文明过程,我们的文化材料,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中国翻译的理论原创性的根据所在。这就要求我们的翻译理论家应该是个通才,通中外,通古今,而不是光通那么几个概念。西方理论的发展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思路就是对继承原有的体系和学术逻辑进行演绎,接着说,或颠倒着说;另外一条思路,就是直接面对一些经典的文本,进行现代的阐释和重读。这就告诉我们,本土的翻译现象和翻译经验,是产生原创性译学原理的最深厚、也最值得珍惜的文化资源。

那么,我们中国译学的功用何在?意义何在?我们有必要从古代译论中,体验出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的原创性

译学原理。好在汉字具有超强的表达功能和稳固性质,中华译坛的古贤先哲的事迹及心迹相当完好地保存在历朝历代的典籍中,今人解读起来并无太大的障碍。我们应该直接面对支谦、道安、鸠摩罗什、彦琮、玄奘,等等。如支谦写的《法句经序》,不妨认为就是写给我们看的!可以悬置前人的见解,直接面对支谦,读出我们自己的真切体验来,然后再去和前人对话,这样才能产生我们的新鲜的创造性的译学体验。中国古代译论从来都不是架空立论,而是时时以体验为先导,在体验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凸现体验之维也就是突出对象的当下性与具体性。人们面对译论的体验是一种“共同感”(康德)或具有“主体间性”(胡塞尔)的心理感受,因为人作为“此在”乃具有“共同此在”(海德格尔)的性质,或者是一种“社会的存在”(马克思)而不是孤立的单个人。翻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现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范围内,翻译体验就必然具有普遍性,这种体验的普遍性恰恰是翻译理论可能存在的客观基础。如何将这种普遍体验转换为一种知识形态则是翻译理论面临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我们的学术姿态和研究方式。要使我们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的优势,必须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要养成中国式的人文情怀、文化姿态和叙事方式,直接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体验和思辨出具有自己文化专利权的原理、原则。然后对东西方的原理、原则进行互相参照,互相贯通,相同的东西通之,不相同的东西比较之,在参证比较中得出更深层次的结论。

20世纪中国翻译的经验,我们认为是人类第一流的经验。哪个国家有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哪个国家有我们百年间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哪个国家有我们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哪个国家有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面对

一流的经验,我们应该概括出带有我们至深体验的第一流翻译理论,为什么非得把我们的一流经验,套在西方人现代性、或者说是后现代性的马车上呢?现代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待证明,在西方就因不同时代、不同学派、不同学者,存在着并不一样的内涵,你讲的是哪个现代性?那么中国的现代性是不是也需要依照欧洲标准或美国标准?再说,现代性价值也并不完全排斥传统价值。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如果进入中国的文明过程,大量地汲取中国本土的经验、智慧,进而中西融通、古今沟通,那么我们的翻译理论创造就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模样。欧美人用他们的笔,写他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笔难道只满足于“耕人家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吗?作为一个现代大国,中国是不是要在翻译理论建设上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话语体系,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时代课题,值得我们深而思之。

我们不揣学识浅陋,将多年来对译学研究的所思所想,以问答的形式写成这本《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全书分上、中、下三编,试图在一问一答之间,或从理论的高度,对翻译理论作整体性的把握和多方位的思考;或秉持中国传统译学理论、借鉴西方译论话语,从某一特定视角出发,对所论议题进行剖析,在具体分析中去探索译学的奥秘;或以哲学、美学为纲绳,探测、挖掘翻译这一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的丰富内涵,字里行间从一个个侧面映现出译学理论研究在艰难中探索前进的轨迹。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关心与支持!同时也衷心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教与批评。

目 录

前 言	1
-----	---

上 编

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	3
翻译本体论概述	9
创建中国翻译学的立足点	18
翻译学建设过程中传统的定位和选择	24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	39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42
中国传统翻译批评的超越性价值	46
翻译理论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58
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61
我国传统译论美学思想	71
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翻译定位	76
中国传统译论的科学精神辨	79
马建忠翻译思想的现代转换示例剖析	87
中国翻译美学建设问题	101
20 世纪中国翻译学发展历程回顾与思考	104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迪	107

中国翻译研究流派建设及其意义·····	117
中西翻译研究方法的异趣根源·····	129
比较译学之于当代翻译研究的话语方式·····	134

中 编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研究偏向·····	147
修辞学零度——偏离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阐释力·····	149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研究偏向·····	163
翻译研究的文化理论向度问题·····	168
文化旅行理论与翻译研究·····	172
毛姆作品译介经典化过程及启示·····	180
莫言作品获奖的翻译学思考·····	198
葛浩文英译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再思考·····	202
典籍英译与文化软实力持存:以《道德经》为个案 ·····	210
典型《道德经》译本评述:厄休拉·勒瑰恩的贡献 ·····	225

下 编

数字化时代翻译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考·····	247
数字化时代是否需要重新定义翻译? ·····	252
翻译服务实业化问题·····	254
语料库翻译研究再认识·····	255
双语词典研究之于翻译研究:以《新时代英汉大词典》为例 ·····	259
翻译学词典的定义与释义原则·····	271
近代中国新术语与术语翻译问题·····	277

严复译名存留问题的文化考察·····	288
中国现代学术术语译介方法流变:以 Logic 为例 ·····	292
从 Fans 翻译历程看外来词在中国的接受 ·····	307
关于词典收录字母词问题的探讨·····	319
汉语音译词现象的文化剖析·····	322
研究型翻译教材的编写理念·····	334
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今翻译人才培养·····	337
翻译硕士专业人才培养刍议·····	345
索引 ·····	361

上

编

为什么说在中国翻译理论界的“杂语喧哗”中,在各种不同的理论意向、理论话题和理论思潮论争中,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成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对于翻译学科的自身构成与确立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对于翻译学学科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答:本人认为,中国当下的翻译理论领域,出现了对翻译命题、翻译视角、翻译思潮探讨的“杂语喧哗”局面,其中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构成了关乎翻译学学科发展的具有根本意义的研究向度。翻译理论元理论向度的有效展开对翻译学科的自身构成与自我确立也可能是最有意义的。翻译理论的元理论走向是理论和现实之间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结果,也是理论自身面对现实变化所必须做出的学术选择。当下的众多翻译理论话题无疑都可以纳入这一学术视野,对翻译理论元理论向度的充分认识,能够催生翻译研究的本体自觉。

所谓“元理论”,就是理论之理论,思维之思维。元理论研究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以最一般的公共概念作为研究对象;二是经常咀嚼学术传统中的老问题,反思并重新整合自身。因此,翻译理论的“元理论”研究就是翻译理论对于自身的审度与省思。在目前的翻译研究领域,翻译理论的元理论问题虽然受到普遍关注与表达,但至少在国内,仍较少有从理论建设的高度对其进行分析和阐发的学术努力。翻译理论“元理论”问题的产生有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原因:就理论而言,作为翻译理论的理论根据和思维范型的哲学、文化思想变动而多元,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和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观念的多元化演变,使得翻译理论原先的理论基础不再牢固或受到质疑,从而导致“元理

论”问题的产生。就现实而言,社会文化与翻译现状的复杂多变,使得翻译理论自身的确立方式、存在方式、表述方式以及有效性等方面的“元理论”问题凸现出来。

在当代,翻译理论之为理论的哲学基础变动不居、翻译之为翻译的现实因素复杂多变,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反理论潮流。实际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要求的并不只是对于理性权能与理论思维的批判、限定、贬斥,而更主要的是对新的意指方式与理解方式的诉求。这样,就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理论本身的性质与意义,以及它与现实的关系,尤其需要理解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的表意方式与真实意指。也就是说,包括翻译理论在内的后现代理论将以一种新的关系与世界相关联,以一种新的方式作用于现实,并从一种新的方向上被理解,西方近年来问世的翻译理论著作(Levy, 2011; Bassnett, 2013; Andre, 2014; Robinson, 2016; Cronin, 2016; Gentzler, 2016)^①,多数充满了对元理论的焦虑和对新的意指方式的探索。

如果仍然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或视角去理解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只能将理论撕为碎片,其结果就是不绝如缕地宣称任何

^① Levy, Jiri. *The Art of Translation*[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the New Critical Idiom)*[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Andre, James. *Thinking Through Translation with Metaphor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Robinson, Douglas. *Exorcising Translation: Toward an Intercivilizational Turn*[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Cronin, Michael. *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Gentzler, Edwin. *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in the Age of Post-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理论不再可能、理论碎片化的“解构”与“后现代”论调。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因此可以看作是面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反理论浪潮,翻译理论在“自我意识”层面上的反拨。因为反理论潮流的流行与强大,翻译理论元理论向度的“自我意识”常常被压抑在无意识与潜意识层面。因此,翻译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常被当作不合时宜的动向加以忽视,在当下的理论场景中,也就出现了极度膨胀的理论意识同理论的过度谦抑与不自信并置的奇怪状态。元理论思维是理论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认知,自我论证与自我坚持。对翻译学学科的反思,只有保持在一种元理论层次上才是正当和有意义的,否则就是在拿一些外在的东西和不相干的要求,来苛责翻译理论,而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同不见。从元理论思维出发,揭示翻译学理论建立的更为本质的前提和翻译学理论展开的更加真实的基础,才是翻译学理论和翻译学学科反思的正途。而翻译理论的元理论走向将为我们带来翻译理论自身的“本体化”和“寓言化”。

翻译理论元理论走向使得翻译理论脱离其原先所依凭的观念体系,得以作外向运动。而按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那远离起源而作外向运动、甚至不再返回之物,像“存在”一样成为被发送之物,即形而上学之玄远或渐远的本体,而“被发送”就是被发送之物的本体化过程。^① 因翻译理论元理论走向而致的翻译理论“本体化”,将翻译自身的“存在”问题推到了翻译界面前,迫使翻译学人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问题。过去,翻译理论作为人类观念体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需要对翻译与翻译现实负责,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个庞大的人类观念库负责,

① 金惠敏. 媒介的后果[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